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十)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因，是讲课存有硬伤，内容老套，缺乏新意，不免令人乏味。深层次原因是学识功力薄弱，没有能掌握必要的第一手材料，而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治学工具——英语没有过关。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实施改革开放方针掀起的学习英语和新知识热潮中，北大工会乘势为教职员举办英语业余夜校，大家纷纷踊跃报名，课堂上多为面熟的年届三、四十岁的同事。我们年近中年，更觉时间的急迫和珍贵。那时真有一种拼搏精神，将学好英语视为人生又一个拼搏，力争博得成功，让自身的业务能力更上一层楼，在工作上开辟新天地。我怀着这种愿景，设法妥善安排好担负的工作任务和家务琐事，尽可能挤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上好英语夜校，“废寝忘食”地“恶补”，“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那段时间，似乎成了我为英语过关奋力拼搏的“日日夜夜”。这和我在反右派斗争时期陷于思想苦闷，深受煎熬的“日日夜夜”是绝然不同的精神状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从英语几近荒疏的基础上起步，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连续通过了中级班到口语班的课程，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

1980年临近学习结业，我在教研室的支持下，马不停蹄又报考了由当时中国国际经济管理学院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合作创办的“北京经济英语培



(右图为：赖荣源(右一)在椰加达观影时于电影广告的新事物和新观点，拓宽观察和思考问前和堂姐及同学合影)

训中心”。通过严格考试，我终于如愿被录取为该培训中心的首批学员。该培训中心实施初、中、高三级阶梯式循序渐进的教程，各级教程均设有语言、文化和工商管理三大课程板块，多元课堂教学和课下自修兼顾，听、说、读、写四会贯穿始终。在美方多位外教标准地道的教授方式的熏陶下，我们得以不出国门也可以亲身体验到“留学”的学习效应和成果，专业英语水平得到了全面的明显提高。人近中年我总算赶上“学识补课”的“加班车”，为今后自己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打下一个良好基础。

俗话说“机遇会降临有准备的人”，这似乎在我身上得到应验。1981年我完成培训中心的学习任务回到学校时，当时教研室负责人(当时主任洪君彦老师赴美做访问学者，由党支部书记张康琴老师代理)突然找我谈话，商量我是否能“乘热打铁”为经济系开设经济

专业英语课。她告诉我原来负责教这门课程的外请教师因教学效果不佳已被辞退，转而拟请本系一位懂英语的厉老师讲这门课，无奈这位老师表示他“自学成才”的英语是“哑巴”和“聋子”英语，只会阅读不会听和说，难以胜任。康老师强调现在这门重要的必修课程实在难以物色到适合的人选，陷入师资短缺的窘迫境地，面临无法开课的“危机”；而我原来准备的课程“资本主义货币和银行”，则较易找人替代。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的教学任务使我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我深刻认识到，为了贯彻“教育要面向四个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培养业务过硬的合格涉外专业人才，北大需要吸取以往英语教学和实际应用相脱节的经验教训，开设经济专业英语课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我也清醒地意识到担任这门课程，就意味着我必须改行，会丢失专业知识的“老本”，就像有

的同事曾描绘的那样，任教专业英语基础课，最终可能会“沦为”某种讲“简单重复”基础课程的“教书匠”，今后可能会对自己的业务发展和专业职称晋升不利；何况根据以往的老传统看法，外语工具课往往被视为辅助专业主要课程而设的边缘课程，而且讲课的老师似乎往往也是因有某种问题受过处理没有被重用的边缘人员。可能出于这种缘由，有的同事要我审慎考虑后才作决断，连洪君彦主任回国后得知我已改行也曾表示过惋惜。不过，当时我从大局出发，经过认真的全面考虑与权衡利弊，清楚认识到这门不可或缺的专业英语课无论如何再也因为“无人能上”的“危机”情况而断然被取消，现在领导正式提出要我担当，而我又是一位受过英语培训中心专业教育的教师，在一定程度上，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语言技能，理应出面担当现实迫切需要的这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正是在这个思想认识的指导下，我遵从领导的有关安排，毅然决然“临危受命”肩负起为北大经济系(学院)开设一门必修课程——经济专业英语的重任。

专业英语课是为在高等院校经济专业的学生完成基础阶段英语学业后，培养学生能以英语为工具阅读有关经济专业书刊而开设的一门前所未有的课程。上世纪80年代初，据悉开设这门新课程的高校仅有三家，除北大外，就是上海复旦大学和天津南

开大学(后者的任课老师也是我在北京经济英语培训中心的学友)。我自己并非英语专业科班出身，欠缺相关的知识与教学经验，心中不免有些战战兢兢。值得庆幸的是，北大具备教书育人的“天时地利人和”优越条件，使我的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北大是知名学府，其中经济系的“特菜”专业——西方经济学科更是人才济济。开课之初，我得到许多前辈老师的精心指导与无私辅助，特别是造诣颇高的学者教授罗志如先生。我开课的第一年，他每周坚持花两个上午的时间就我备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疑点做课前的答疑解惑，为讲课把关，使我的课堂教学得以逐步做到完善无误。这段“将军扶我上马赴战场”的经历成为我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勇往直前的原动力。此外，北大还聚集着众多的外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有的还是中英文兼通者。当备课过程中遇到一些生僻的典故与用语，或需就某语言点做中英文对比分析时，我经常找他们帮助解读清楚，有机会还设法请他们乃至他们的夫人，客串教授口语方面的辅助课程。

经济系(学院)在“硬件”和“软件”方面也十分“给力”，为我开放“绿灯”，予以“特殊政策”，使我得以按需自由公费选购相关书刊和参考书，请人打印各类教材和参考资料，其中还包括分发给学生的教材，放手让我自行编选和使用与北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十一)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作者：赖荣源

大学生的水平和需要相匹配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各类英文教学资料，上述所需费用几乎全部由公家报销。经济系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在我流动到图书馆以后依旧得到延续)，使我掌有较充分条件在教学实践中放开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凭着自己相对扎实的功底，有的放矢地力争做到：按照改革开放事业的实际需要，在专题单元和文体类型诸方面“因材施教”，精心选编教材，坚实稳健的基本教本和灵活多变的活页文献密切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针对北大学子的水平和特点，“因人施教”，精心“定制”教学诸环节的具体实用方案，以期北大学生能通过这门课程获得真正的学识。在教育质量、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教书育人诸方面，参照先前在英语培训中心体验到的一些美式教学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做多层面的颇为有益和有效的探索和尝试，试图根据我自身条件以中英双语教学的变通方式逐步向美国“READINGS”专业课程靠拢和接轨。

在相当长的时期，专业英语课似乎成了学生乐于花时间与精力的“高耗能”的“热门”课，一度曾有教研室领导要我做学生的工作，避免重此轻彼的偏科现象；有的外校进修老师、外国留学生和英语系学生也来旁听或选修，其中有的因跟不上进度而中途放弃。“功到自然成”，经过在经



赖荣源正在备课

济专业英语的教学园地的辛勤耕耘，我驾驭专业英语课的能力逐步得到锤炼，教学效果不断提高，课程的质量也逐步改善，走向成熟。基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学校连续两届在1984-1985学年和1985-1986学年授予我教学优秀奖。1986年底我因故离开经院以后，学院的领导和老师一如既往关注我的教学情况。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石世奇教授在提到学生对我的教学工作的反馈意见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学以致用，“我们在毕业时应聘面试的内容和方式，许多是过去赖老师教过的，我们学过和考过的”；他还跟我提过，我那篇应学校教务长办公室之命撰写的教学优秀奖获得者教学总结报告，言之有物，写的多属实情实理，很有意义，胜似一篇专业文章。在我的教学初见成效时，有一次跟外教见面时，原来不怎么赞成我任教这门课的洪老师还特地当面称赞我是一个“capable man”。这些评语，似乎有过奖

之处，不过，至少我可以视之作为一种鼓励和支持，也算是不枉我立志做一名合格教师的一番努力和坚持。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86年秋经济学院进行职称评定工作，我提出的副教授任职资格申请因资历和论文方面的限制条件未能通过。此时为了缓解学校职称评定工作中“历史欠账太多”和“僧多粥少”的窘境，北大实施了校内人才流动措施。而借此机会，北大图书馆正筹建的情报研究室从校内各系所积极招聘相关的合格专业人才。当时也流动到图书馆并负责筹备该室的副馆长徐雅民恰好是我的老同学，他了解我的情况后，为我的职称评定问题鸣不平，表示会优先考虑给我流动名额，让我能搭上阶段性职称评定的最后一班车。而这时刚担任经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石世奇同志知道情况后，立即在百忙中利用午休时间，骑着自行车赶到我家里，找我商量我的去留问题，代表学院领

导表示诚心挽留之意。

作为老同学，我们推心置腹地交换彼此的想法与意见，以求找到解决问题的“双赢”办法。他充分肯定了我在教学工作中发扬了无私奉献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担当，白手起家，成功开设了一门深受学生欢迎的新“热门课程”，为学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和成绩。他强调学院需要这门切合改革开放需要的必修课，切望我能留下来继续教授这门课程。他郑重表示学院领导一直特别关注我的职称问题，虽然这次评职称工作，由于名额有限和其他条件限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学院领导下了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尽早解决我的职称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变通的解决办法的设想。他当时设想通过有关规定程序授予我第三个“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以“三连冠”方式“破格”解决我的职称问题；后来胡代光院长则向我表示可以亲笔批条，将设法采用学院自筹经费的“地方粮票”（相对于学校颁发的“全国粮票”）的方式解决我的职称待遇问题。事实上，阶段性的职称名额紧缺，职称评定时限紧迫，而评定工作又深受向“论资排辈”和“论文至上”的局限。

在这种氛围下，院领导设想的这些承诺均领导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无奈之举，实际上解决不了眼前的现实问题，这也十分难为学院领导。而那些天我个人在去留问题上也令我陷入

激烈思想斗争的“不眠之夜”，最终在矛盾与纠结的状态下经多方的协商，“快刀斩乱麻”找出“两全俱美”的安排，我以副教授的身份（名义）流动到图书馆担任副研究馆员的工作，据悉经济学院向图书馆提出的附带条件是让我“双肩挑”，继续为经济学院讲课。

事实上，基于三十年间积淀的对经济系（学院）的深厚情感和作为副研究馆员可“近水楼台”利用馆藏文献备课的有利条件，这种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我这个“书虫”的意愿和志趣。离开经济学院已成定局之时，教研室提出是否要开一个欢送会，我表示不用开，人虽要离开，课我依然还要继续讲下去。不过有一件事深深地给我留下美好印象。那时我正给84级世界经济专业的学生讲课，当我给他们上完最后一堂课，准备下课时，突然学生课代表捧着一座塑有偎依于牛背的牧童形象的陶瓷笔筒台灯，代表全班同学向我深表依恋不舍之情。这份寓意深邃的礼品对我来说，是一种无言的鼓励和鞭策，促使我坚持以“孺子牛”的精神认真做好专业课程教学和图书馆的业务工作。离开专职教学岗位之后，我还曾挥笔分别给丁石孙校长和经济学院领导写了一封长信表达我对职称评定工作和专业英语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聊作“告别留言”，希望学校和学院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更加完善。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十二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藏书楼中

我的工作单位由经济学院调换到图书馆。根据经济学院和图书馆的“特例”协议安排,我除了在图书馆坐班办公外,还需继续担负原来的教学任务。面对这个新挑战,在经济学院和图书馆领导的支持下,我依据自身的志趣和能力,积极主动“穿梭”于经济学院与图书馆之间,尽力将专业教学工作和文献咨询工作两者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备课讲课乃至文献咨询及编著诸项工作渐次变得“得心应手”。由此,我的整个业务工作日臻完善,渐入佳境,似乎经历着某种所谓从“必然王国”渐入“自由王国”之感知境界。当然我的这段美好机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在教学改革中“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特殊时势造成的。正由于这种局限性及与此相关的我在业务方面的一些“先天不足”和短板,我的教学工作水平距离教学改革不断发展的需要势必渐行渐远。实际上,到了2000年



1997年6月在北大图书馆书台前咨询值班

后,随着北大学子英语水平普遍提高,听课学生中原有的某些考试作弊和成绩不及格的现象趋于消失,而在经济学院多门涉外内容的专业课程也已陆续开设,此时专业英语课(在一定意义上对前者曾起过某种“铺垫”作用)正如经济学院的教务部门所云“至此显得趋于重叠”,需适时撤下课表。到此,经济专业英语这门课算是“功遂身退”,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而我的教书生涯也就此画上句号。

一扇门关掉另一扇门又打开,机遇再次眷顾有准备者。此时我的工作重点也业已逐步转至专业文献的收集和咨询及编撰这一新天地。在图书馆的工作

岗位——新设的美国文献室,我一如既往充分发扬敬业精神,发挥从事专业英语教学中积累下来的专长和经验,在馆内主动穿梭于各个部门之间,了

解和熟悉相关的运作情况,结合文献室的特点和需要进行协作;在馆外则积极联系国内外相关机构和人员,通过采购、捐赠和其他方式多层面收集相关书刊及其他类型出版物,充实和丰富馆藏,为文献参考咨询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美国文献室经济和社会科学的书刊及其他类型出版物的收藏原来相对薄弱,渐次变得充实,相关文献参考咨询工作也得到明显的加强和改善,能够更好地满足读者用户的各种现实需要。在我的主持下,应经济学院一位同事之约,为她的研究生们系统介绍美国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和参考工具书,她还提出我可以和她一起共同带研究生,不过我馆没有这种先例,且考虑到我自身条件,只能婉言推辞了。我根据有的老师的实际需要,协助多方搜集相关专题资料,她们撰写的文章发表时客气地将我视为第二作者;有时也应邀作一些文字翻译(审校)或高级职称评定中的专业英语水平考核工作。美国文献室的工作也得到美国驻华机

构和美国访问学者和友人的肯定和支持,他们捐赠了众多书刊,有不少是我馆缺藏的书刊。其中有位原美国驻外大使张芝香女士,卸任后来到北大表示志愿参与北大美国研究中心的工作,她多次来参观访问美国文献室了解情况。当我退休时,她特地盛情提出返聘我继续“关照”美国文献室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她的积极努力,募集到一笔资金,其中为我室选购一套美国学研究的经典文库,1998年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时,又以他的名义将这套文库作为一份礼物赠予北大图书馆,张女士曾戏称之为“借花献佛”之举。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图书馆工作期间,庄守经馆长十分重视发挥我们这一批流动过来的专业人才的作用。凭借在英语和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关领域具有一定的扎实功底,我得以有机会和图书馆同仁合作参与图书馆多项重要工作和活动。1990年代初国家教委组织实施《211工程实施纲要》,把建设中国高等学校文献信息服务系统确定为优先建设的一项公共服务体系之一。为此,1992年底,在国家教委文科文献信息中心领导小组指导下,作为国家教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由教委社科司立项,成立了“高校文献资源建设研究”课题组,由北大图书馆馆长庄守经同志任组长,我

是成员之一。

1993-1994年,为配合国家教委文科文献信息中心的建设,课题组进行了关于《国家教委文科文献资源建设方案》、《文科文献资源建设学科表及分工方案》以及设点方法和评估方案诸项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此后,我还曾担任过教育部高校文科图书馆引进中心书库主办的《外文图书介绍与报导》的责任编辑。

此前,1989年,北大图书馆为了促进本馆的现代化,筹建数字图书馆,组团赴美国进修考察,我以美国文献室研究人员的身份参加。在美期间,我得以同美国社会“亲密接触”,积极主动地与美国同行多层面进行互动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同时也想方设法广泛收集美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书刊和其他相关资料。一些接待机构负责人称许我们团队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展示优良的专业精神与水平。

访问期间还发生了颇为有趣的一段机遇。在接待我们进修的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卫博士的周全安排下,美国新闻署(USIA)正式邀请我们以北大图书馆代表团的正式身份专程赴华盛顿访问该署及其他相关机构。鉴于代表团无其他合适人员(既懂英语又较了解美国情况),原为普通会员的我“赶鸭子上架”,不得不“破天荒”第一次充当团长的角色。这样,我必须赶时间作



赖荣源(右五)等在听俄亥俄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华卫博士这次访美进修和考察时(右四)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十三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行前准备工作,行前向其他成员介绍访问对象的情况;在华盛顿,我负责向美国新闻署方面全面介绍北大全校关于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教学与研究情况以及北大图书馆相关书刊的收藏和参考咨询工作。此外,根据访问计划我们还到著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政府出版机构(GPO)和教育信息研究中心(ERIC)等机构参观和进行专业交流。美方对这次访问颇为重视,主要负责官员亲自接待,还全程配备两位翻译。不过,我们一般还能自主与美方对话,翻译们基本上在一旁休闲。我们认真务实的态度使这次参观访问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收获颇丰。事后,图书馆领导对访问结果包括我意外扮演的“团长”角色表示满意。

讲校史间不长,体验和感受也不太深刻,不过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似乎我的“美国梦”也得到实现。说到我的“美国梦”,不禁联想到那年6月前后的特殊日子,进修即将结束时,在俄大图书馆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当时我在会上致辞,说到“My American dream comes true”这一句话时,意外地发现,美国友人的脸上骤然流露出惊讶的表情。我随即意识到他们肯定是领会错了,误以为我有滞留美国之意。实际上,在那年国内发生6月风波后,据悉正在出国访问的个别北大



全家人在纽约“实地体验”中国在联合国的神圣地位

同事,其中也有我相识的,借机滞留,以期取得所在国的长期居留权。而我自己也曾接到交往多年的一位美国友人的电话,善意地表示,如果回国不安全的话,可到她那里想办法。后来又有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当面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她可帮助我在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一份工作做。不过我均婉言谢绝她们的好意,告知她们我回国不会有安全问题,请她们放心。其实,我认为美国再好,毕竟是别人的家园,我怎么可能舍弃培养我三十六年的祖国和我为之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北大燕园呢?于是我立刻向她们解释道,我的“美国梦”不是指一般大家所说的欲留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指作为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美国问题的学者,历经沧桑,终于在年过半百之际才有机会亲自来美国学习参访,深感唯有把握住这次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将学到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带回中国,带回北大,报效自己的祖国和母校,我的这个“美国梦”才算真正圆满。误会烟消云散,双方一笑释然。

1992年,北大图书馆根据参加全国文献资料调查与布局研究的工作经验,首次对馆藏(西文文献为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与质量评估,并在这个基础上内部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一书。在这项工作中,我担任副主编,负责经济学部分的编撰工作,作为全馆的试点,先行一步,随后还负责哲学、政治等总共四门学科的编撰工作。初稿完成后,我们向专家学者征求对这些报告的意见,专家学者们反响热烈,评价很高。其中,政治学科的报告获得了政治学系有关专家的赞许,认为报告颇有助于了解国外的政治学科及其相关文献的发展动态,对北大政治系制定教学与研究改革方案也颇有启示。尤其是对经济学科的报告,经济学院的老院长、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表示“尽两日之力,详看了报告并翻阅附录资料”,认为“这项工作过去没有人做过的,调查详细,书目选得好,估计适当,对图书馆经济学及其他书

刊购置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经济学院两位资深教授范家骧教授和刘方域教授看了报告后,还主动将其推荐给《北大学报》,经必要的修改后予以发表;《光明日报》编辑人员向我了解情况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详细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以飨广大读者;北京的一家高校出版社还专程到图书馆索取这份报告中有关历届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的调查资料,为今后翻译出版相关文集作参考,并邀请我将来参与相关工作,因该研究领域非我所长,我予以婉拒,他们过后还特地托人酬谢。

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期刊部的负责人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这份报告是整个报告文集中最有分量的,材料详实,分析评估透彻到位,尤其是对馆藏国外期刊文献的质量进行量化评估所取得的数据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所揭示的文献离散规律。这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并不知什么叫文献离散规律,真可谓“无心栽柳柳成荫”。正是由于上述的机缘,在由北大图书馆主持的国家教委关于“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项目的工作中,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的子课题之一“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研究”项目属下的《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版、2000年版和2005年版)的编撰工作(从前

也曾邀请过我参加有关中文核心期刊总览的编撰工作,我以平时很少翻阅中文期刊为由予以婉拒)。除了担任编委之外,还先后负责编撰经济学科和政治学科等核心期刊研究的相关报告和数据资料。《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的正式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文期刊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空白,为我国的科研成果评定和职称评定工作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对我个人而言,参与上述几项工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多年前研究生同窗好友曾半开玩笑地戏称我为勤于动脑而疏于动笔的“书呆”,这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我在业务工作上的偏颇。以往我满足于或受制于一种理念的思维局限,认为将学生培育成才就是教师成绩的最好体现,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完善和参考咨询工作质量的提升就是图书馆工作者业绩的最好体现。虽然平时针对某些课题认真思索后,有时头脑中会产生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或看法,但往往因主观上欠缺必要的动力和激情而疏于动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就养成了疏于动笔的行为习惯。往日境外的老校友和在北大出版社和著名财经杂志工作的一些学生曾先后约我撰写有关回忆录、涉外财经问题等文章,或将自编教材加以整理加工成正式的教科书出版,对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十四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用各种理由或托词怠慢置之，致使许多锤炼和提高自身动笔能力的宝贵机会从身边流失。上述几年“遵命”参与编撰报告或撰写文章的实际经验与体会，促使我无形之中渐次摆脱了往日同窗好友称之为“勤于动脑，疏于动笔”的惰性，得以继续翻开自己事业上的新篇章，避免在自己的人生道路留下过多的遗憾。

回首往事非如烟，如果说人生轨迹总会有什么一段华彩之说的话，那么就我自己的愿景和能力所及而言，这一段藏书楼中的经历同成功开设经济专业英语教程一样可算属于我自己的华彩机遇——弥足珍贵的一段美好人生经历。为此我深切地感恩母校北大，2018年5月正值北大建立120周年大庆之际，我由衷地将自己的人生感言寄往母校：“古人云‘书海无边勤为舟’，而北大犹如一艘深谙教



赖荣源(右四)在纽约大学校园女儿公寓师生聚会

书育人之道的智慧航船引领我们莘莘学子畅游学识大海，在大风大浪的社会实践中见世面经锤炼，在风平浪静时身处书斋课堂潜心攻读万卷书。北大母校的精心培育铸就 and 增强了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心和能力。在北大母校学习和工作四十余载的经历使我逐步体验到弥足珍贵的人生感悟：下功夫夯实好学识的宽基础，人生的际遇和机缘会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当机遇的一扇门关闭而有另一扇门打开时，你能发挥厚积薄发的后劲潜能，让自己的人生道路得以良性延续下去……此时此刻似乎会或多或少地体验到某种由自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生感悟。”

退休“物语”

1998年从教学工作岗位完全退休后，我开

始过着“颐养天年”的生活，体验新的人生情趣。作为空巢家庭的赋闲者，我和现已故夫人毛美华宛如候鸟多次飞往美国，探访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女儿赖芳（经济学院1995级学生），有较多的机会实地接触美国社会，体验异域的生活情趣。2005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们参加赖芳的毕业典礼，见到了她的两位导师，他们知道我是北大的经济学同行后，特地安排几次会面交谈。其间，他们详细讲述指导博士生的育才之道，对赖芳毕业之后的立业成才寄予厚望，表示愿意送上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段互动交流，在教书育人、因材施教和成才之道诸方面对我们颇有启示。

此后，赖芳赴纽约任教期间，我们有机会参与她同事的一些社交活动，同当地的普通美国人“亲密接触”，长了一些见识。有一次我们一家应邀参加她犹太人同事的感恩节家宴，入席前交谈时，主人的老母亲执意向我提出中国为何不搞像印

度那样“优越的民主制度”的尖锐话题，当我耐心跟她晓之以理时，她却突然变脸，对此不肖一顾，拂袖而去，真是有点不可理喻。

实际上她仅在80年代初到过中国一趟，看来固执成见蒙蔽了眼睛，似乎使这位老太太失去理智，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的现实视而不见。不过，入席时氛围显得和好，她和我相伴落座，大家共享火鸡美餐，尽情畅谈生活趣事。又有一次我们参加她同事的聚餐会，席间有一位搞教育研究的年轻学者对中国中学教育情况特别感兴趣，诚心向当过北大附中校长的毛美华详细询问相关情况和问题，一问一答似乎成了业务方面的非正式互动交流，这无意间对增进彼此的了解与友谊会有裨益。

在纽约大都会，中国留学生较为集中，赖芳与留美的北大同窗好友联系较为频繁，经常互动走访，安排聚会，这样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实地见证了我们的过去教过的许多学生的事迹。他们同留在国内的同学们一样，在异国他乡和金融、工商管理、IT、文教、学术诸多领域，兢兢业业地治学立业，经多年奋力拼搏取得了骄人业绩，深感他们代表着我国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新时代潮流。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振奋与欣慰。触景生情，不免使我想起1998年在北大100周年校庆期间，我曾

对电视台记者抒发的一番无限感慨之情：“我们这一代北大学生1950年代考入北大，心怀‘向科学进军’的壮志，却因当时历史原因‘壮志未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科教建国’的任务，我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并愿作大进军中的人梯与铺路石。”这一代年轻人已经和正在创造的诸多业绩说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在国内多条战线、多个领域的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而且在海外能够跻身和活跃于大大小小的“世界民族之林”之中，为祖国与民族增添光彩——这正是我们终生献身于教书育人伟大事业的初衷所在。

回首往事，我在北大的人生经历似乎证实了“树挪死，人挪活”或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类的老话。从1981年至2001年，我在经济学院开设专业英语课二十年，其间我在北大的工作单位发生变动，从经济学院转至图书馆工作，身份也由专职教师转换为研究馆员兼职教授。在充满发展机遇和挑战的北大燕园，唯其有这个变动和转换，我开设专业英语课的机缘方能像一个原生性的机遇那样，发挥其倍增效应，衍生了多层面的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为我在北大的“后半生”乃至退休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人生意义和情趣，使其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赖荣源 完



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女儿赖芳的毕业典礼